

“世界史学会第 20 届年会”综述

杜宪兵 管世琳

2011 年 7 月 8—10 日,由世界史学会(World History Association)^①主办、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全球史研究中心^②协办的“世界史学会第 20 届年会”在首都师范大学召开。这是世界史学会历史上规模最大的一次会议,来自三十多个国家和地区的五百多位学者与会,其中包括国内二百多位从事世界史或中国史研究的专家和学者。在两天半的时间里共举行了一百多场分组会议和 12 场圆桌会议。此次年会的两大议题是:“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与“中心—边缘视角中的世界史”。学者们就世界历史的理论与方法、世界历史上的中国以及世界历史的教与学等诸多议题进行了深入研讨。

一、世界历史的理论与方法

世界历史研究在理论与方法上的突破或创新是与会学者们普遍关心的问题,也是多个分组会议和圆桌会议研讨的内容。20 世纪 80 年代以降,全球史研究蓬勃兴起,此次年会在议题的择取和与会者的论文选题上大都体现出全球史的治史方法。世界史学会主席阿尔弗雷德·安德烈(Alfred Andrea)致开幕词,并授予首都师范大学校长、世界史学者刘新成“世界历史先驱奖”,以表彰他在全球史理论、实践、推广等方面作出的卓越贡献。首都师范大学的齐世荣教授在致辞中提及当前盛行的历史研究的“碎片化”和烦琐考证倾向时指出:倡导历史学家在进行微观研究的同时,应以更广阔的全球眼光进行宏观研究,世界历史并非民族国家历史的简单

叠加。教育部副部长郝平在开幕式致辞中指出,世界史学科的建设揭示着人类社会进步的重要趋势,世界史从二级学科提升为一级学科充分体现了中国政府对世界历史学科的重视。强化对世界历史的研究与教学有助于不同民族和文明之间的跨文化理解,进而推动全世界的和谐发展。刘新成以“全球史在中国”为题作了开幕式主旨发言。他在梳理世界历史观念在中西两个文化系统中的流变过程的基础上,分析了“全球史观”在中国遇到的不同解读,并认为探讨人类历史的统一性是宏观世界史学的本初指向,也是宏观世界史这一分支学科的存在

① 世界史学会是 1982 年在美国成立的一个国际性学术组织,现有约 1500 名正式注册会员,分别来自四十多个国家或地区。其宗旨在于促进世界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并增进公众对世界史的了解。学会有两种期刊:官方期刊为《世界史杂志》(*Journal of World History*),1990 年创刊,由夏威夷大学出版社出版《世界史学会会刊》(*WHA Bulletin*)于 1983 年首发,向全体会员发放。依照惯例,世界史学会年会连续两年在美国国内举办,第三年在美国境外举行。迄今,学会在美国境外举办年会的地点包括意大利的佛罗伦萨、西班牙的潘普洛纳、加拿大的维多利亚、韩国的首尔、摩洛哥的伊夫尼和英国的伦敦。

② 首都师范大学全球史研究中心是国内第一个从事全球史研究和全球史专业研究生培养的专业学术机构,成立于 2004 年。中心主任是刘新成教授,成员除首都师范大学的一些学者外,还包括北京大学、北京师范大学等名校的知名学者。中心编辑了年刊性质的连续出版物《全球史评论》,至今已出版三辑;并与商务印书馆和北京大学出版社合作,有计划地翻译和出版了全球史相关著作十余种。

前提。

“大历史”研究受到了国内外众多学者的关注,他们积极探讨生命、地球以及宇宙史的宏大模式,倡导和推动考古学、地质学、物理学、宇宙学等多学科的合作研究。“大历史”这一概念的提出者大卫·克里斯蒂安(David Christian)亲自主持了有关“国际大历史学会”(International Big History Association, BHA)发展情况的圆桌会议。俄罗斯国立人文大学的安德雷·科罗塔耶夫(Andrey Korotayev)指出:大历史是对人类“存在”认知的一种新的集成。作为世界史的一个分支,大历史吸收了大量世界各地的人类认知、世界观和方法论,并力图把有关这些世界观的元叙事发展成为一个不断发展的新的综合体。开罗美国大学的大卫·布兰克斯(David Blanks)则认为:大历史只是关于自然史和社会史的众多假说中的一种,当下所显现出来的优点是其较历史而言更为接近于科学。因而他在关注大历史的大众化、包容性与生态倾向的同时,还强调由于认识论和方法论的主观性,不能忽视不同地区(中心或边缘)发展模式的多样性。“小的大历史”(Little Big Histories)的讨论则探讨了对某些地区的大历史的实证研究,如美国伟谷州立大学的克雷格·本杰明(Craig Benjamin)追溯了耶利哥(Jericho)古城建成的环境背景及其发展史,通过这一案例来探究人类历史发展与自然环境之间的关系。加州州立大学富尔顿分校的乔纳森·马克雷(Jonathan Markley)认为:“大历史”拒斥以“民族国家”为基础的历史研究方法,但并不意味着完全脱离“民族国家”的历史。他以黍、稻、竹子和玉米等植物为切入点论述“大历史中的中国”,论述了这些植物在中国历史发展进程中的影响和作用。

在“小地方大世界”的讨论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彭慕兰以京杭运河为跳板作了将中国历史置于世界历史的尝试。他分析了大运河在连接中国与世界方面的作用,因为京杭大运河

为取道运河造访京城的外国传教士、商人和外交官们打开了一扇观察乃至接触沿岸中国社会的窗口。此外,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的马萨科·瑞西尔(Masako Racel)通过对内村鉴三、冈仓觉三和幸德秋水三人的研究,探讨了日本明治时期的世界历史观念。美国纽约州立大学的徐洛阐述了20世纪以来中国的世界历史研究情况。南开大学的王敦书则介绍了雷海宗教授的个人经历及其中西融汇、古今贯通的史学思想。另有一些学者就全球化问题、世界体系理论、汤因比关于全球化的史学思想、浪漫主义史学等进行了深入的探究。

二、世界历史上的中国

此次年会的举办地选在中国,与中国有关的议题则成为年会的重中之重,相关选题纵贯远古至当今,涉及中外关系、中国的发展模式、艺术、移民、教育、女性主义、地缘问题、义和团运动等众多领域。

中外关系是世界历史中跨文化交流和互动的经典研究事例,学者们对此着墨甚多。其中,丝绸之路这条联系中外交流的纽带是国内学者不容忽视的研究对象。美国克利夫兰州立大学的戴安娜·周(Diana Chou)探讨了黄道十二宫的标志从丝绸之路传入中国的过程及其在中国的影响。温翠芳、陈立立等人以具体事例为切入点,论述了丝绸之路与欧亚大陆的文明互动。针对中国与伊斯兰世界的互动,美国纽约城市大学的贤熙·帕克(Hyunhee Park)讨论了10—11世纪之交的穆斯林地理学者对中国的理解。经济交流是中外关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对此,北京大学的钱乘旦论述了澳门在近代早期世界贸易体系形成过程中的重要地位;外交学院的陈奉林研究了古代的西太平洋贸易网络;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则探讨了经济全球化与国家主权的保护问题。另有学者论述了古代中国与周边国家的互动、东南亚的华人社团、中国与中东之间的文化交流、中华人民共和国的

文化外交、“文化大革命”与世界的关联、中国与巴基斯坦的关系、中日关系、中美关系、中苏关系、中英关系以及中非关系等具体内容。在中外关系的研究方法上,有的选题以中国为中心进行自我省思,总结了古代中国的世界观;有的选题基于“他者”或边缘视角对中国进行重新审视。南开大学的张伟伟则从中国在全球史中的地位出发,批判了“中心—边缘结构”。

在“早期近代世界历史中的中国”的讨论中,加州大学欧文分校的王国斌通过对“早期近代”中国的政治变革的研究,反思了以往以欧洲为中心的早期近代世界的研究。他认为“早期近代”在不同地区有不同的内涵与特征,并且这种特性会影响该地区随后近代化的特征。与会学者还对中国的历史人物、城市、艺术等给予足够的关注。成吉思汗、永乐皇帝、文廷式、杨廷筠、梁启超、孙中山、鲁迅、陈垣、陈鹤琴以及李济等人都有论及。透过他们的个人经历,学者们剖析了深邃而又广阔的历史背景以及中国对世界历史的影响。具体到中国城市的研究,以色列特拉维夫大学的马克·盖姆萨(Mark Gamsa)从1898—1946年的哈尔滨入手,分析了中国城市与外部世界的联系。台湾学者张志云透过1902—1931年上海“爱俪园”这一景观的兴衰,阐释了风景、政权与文化之间的相互影响。首都师范大学的施诚探讨了古代泉州与印度洋之间的贸易往来以及泉州的宗教传播。另有学者探究了以汉口为代表的通商口岸从政治中心到商业战场的变革,艺术是跨文化交流的重要载体,学者们的选题很好地说明了这一点。加拿大维多利亚大学的拉尔夫·克鲁瓦泽(Ralph Croizier)回顾了中国画家林风眠的一生,并称其为中国美术全球化的先行者。还有学者研究了宫廷艺术所反映出的文化认同、清代中国宫廷里的欧洲艺术、《红楼梦》里有关中外贸易的历史信息、古典芭蕾在中国的发展历程及跨文化影响、海外的中国艺术及艺术家、传统美学与现代

艺术、当代世界艺术市场上的中国艺术品收集等议题。

除了上述较为集中的选题外,还有学者对中外移民、海外华人社团、国家的战争记忆、中国西部的经济发展、美国在华红十字会、阿拉伯医学与中国脉学等与中国相关的问题进行了探讨。

三、世界历史的教与学

世界史学会在积极推进世界历史领域的学术研究的同时,还大力扶持世界史各分支学科的教学活动,因此,与世界历史教学相关的议题也占据了会议日程的很大比重。

世界历史内涵丰富,国内外学者纷纷就该课程在教学方法上的创新发表看法。服务性学习是20世纪80年代兴起于美国的教育理念和教学实践方法,注重专业学习和社区服务的有机结合。美国西雅图大学的梁侃以具体事例讲述了世界历史课程中的服务性学习。另有学者探讨了中美洲和非洲的服务性学习与世界历史课程结合的情况。来自美国明尼苏达大学的玛丽·乔·梅恩斯(Mary Jo Maynes)、安·瓦尔特纳(Ann Waltner)和艾米丽·布鲁斯(Emily Bruce)等人则尝试从家庭史的角度讲授世界历史。他们在“公元前10000年至今的家庭:一部世界史”课程的讲授中,既注重在足够长的时间框架内通过家庭史这一棱镜来折射世界历史的发展,同时注意比较史学的分析和全球层面的互动,关切不同地区如中国和欧美家庭观念等的不同。美国肯尼索州立大学的张家炎结合15种美国高校世界历史教材,研究了中国在其中的分量。南京大学的任东来、美国萨姆休斯顿州立大学的托马斯·考克斯(Thomas Cox)等学者结合美国的宪政制度探究了中国高等教育中的美国史教学问题。首都师范大学的叶小兵、扬州大学的朱煜、天津师范大学的陈光裕以及美国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艾琳·卢尔(Eileen Luhr)、玛丽卡·马诺斯(Marika Manos)等学者,

在圆桌会议上共同讨论了世界历史课程备课中需要面临的问题。另外几场圆桌会议则分别讨论了世界历史教学中如何教授和评定历史思考技能、如何教授年代学以及如何利用史料等问题。此外,有的学者还探讨了高等院校中的大历史教学问题,以及亚洲、中东、非洲高等院校中世界史教学情况。

除了高等院校的世界史课程的教学外,中学的世界史教学也是学者们极为关注的问题,而且有很多来自中学历史教学第一线的教师也参与其中。首都师范大学的徐蓝、北京教育学院的张静、首都师范大学第二附属中学的刘冬梅以及美国加州大学长滩分校的戴夫·诺伊曼(Dave Neumann)、加州长滩威尔逊高中的安东尼·阿尔扎特(Anthony Arzate)等人,在题为“中学的世界历史教学”的圆桌会议上进行了深入讨论。另一场圆桌会议则探讨了如何利用讨论方式进行中学历史教学的问题。美国俄勒冈州格林沙姆中学的卡特里娜·莱文(Katrina Levin)和密歇根州贝城公立学校的克雷格·温特(Craig Windt)都探讨了将中国文化融入美国中学历史课堂的问题。

四、专题研究

除了上述较为集中的选题外,很多与会学者还有着更为广泛的学术兴趣,研究内容涉及世界历史中的众多专题。其中,历史中的跨文化交流这一专题有多位学者涉及。有些学者关注性别与文化交流问题,比如,美国斯蒂芬奥斯汀州立大学的林达·布莱克(Linda Black)以19世纪末20世纪初英、美在华女传教士为切入点,论述了她与中国女性在教育问题上的交流;有的学者还论述了近代早期世界的联姻模式、南亚佛教中的密宗女性神佛等问题。有些学者则挖掘了礼物背后的跨文化交流。在文明互动专题研究中,有些学者探讨了中世纪时期

基督教世界与伊斯兰世界的共生和冲突;有些学者则从考古学、经文翻译、地缘政治等角度研究了欧亚大陆的文化互动。在区域史或国别史的专题研究中,很多学者基于中心或边缘视角考察了非洲、伊斯兰世界、东南亚等地区以及美、英、日等国家,比如,美国天普大学的霍华德·斯波德科(Howard Spodek)透过甘地的家乡——印度西部城市阿默达巴德(Ahmedabad)折射出20世纪的世界。还有学者针对性地探讨了环境史、疾病与医疗卫生等问题。

综观此次年会,以下几个特点尤为突出:1. 参与面广。在来源地方面,学者们来自世界上多个国家或地区;在职业分布上,既有高等院校的科研人员,又有中学的一线教师,还有来自出版、新闻等行业的专家。2. 议题极具开放性,既广博又精深。与会学者的选题在时间上、空间上的跨度都很大,可以说思路开阔、视角新颖。3. 全球史的研究理路引人瞩目。大多选题都力图打破传统的史学思维模式,运用跨学科、跨文化的方法进行互动研究。作为一个国际性的学术组织,世界史学会以促进世界史领域的学术研究和教学、以增进公众对世界史的了解为宗旨,致力于建构超越民族国家、超越某一特定地区或某一特定文化的全人类视角的历史分析模式。此次会议在一定程度上达到了上述目的。

[本文作者杜宪兵、管世琳,分别为首都师范大学历史学院博士研究生、硕士研究生。]

(责任编辑:任灵兰)